



统一战线视域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演进

——纪念《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八十周年

洪 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006)

摘 要: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的概念,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统一战线属性,是毛泽东用政治概念来命名文化形态的一次重要尝试,扩展了文化形态划分的理论视角,有利于突破传统的、既定的思维局限,改变从单一的阶级角度或从社会性质、意识形态的分野来界定文化形态的习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来考察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遵循这种思路还原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进的基本过程,可以发现在历史坐标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统一战线的内在变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而得出统一战线的内在演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的结论。这对于当前统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增强文化认同和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统一战线;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逻辑动力;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10-0531-08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new democrat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ted front: For commemorat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On New Democracy*

HONG Xu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culture" in *On New Democracy*, pointing out the attribute of new democratic culture of united front. This was an important attempt by Mao Zedong to name a cultural form with political concept, having expande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cultural form division, being conducive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established thinking and changing the practice of defining cultural form from single class angle or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social nature and ideology, and providing a new idea for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By following this thinking to restore the basic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and the intrinsic change of united front were highly consistent in the historical coordinate. On this basi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intrinsic change of united front wa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Thi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lanning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hanc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building up confidence in Chinese culture.

收稿日期: 2020-02-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6-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CKS011)

作者简介: 洪 汛(1987-), 男, 湖南衡阳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

Key words: the united front;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culture;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logic power; historical evolution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已八十年,国内学界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研究一直在持续。“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停滞了一段时间,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研究又重新开始兴起。当前学界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研究主要围绕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建构来进行,包括理论渊源、基本内涵及其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比较。学界在探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涵时,又多注重对其科学体系的整体性描述,如新民主主义文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阶级属性、革命对象、领导力量、动力和发展前途以及如何建设好这一新文化等^[1-4]。对于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关系,尽管学者郑师渠^[5]给予了关注,认为中国共产党阐释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认同,从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但并未较好地揭示两者的逻辑关系。总体看来,国内学界多聚焦在理论探讨上,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历史实践,尤其是呈现阶段性变化的实践演进缺乏应有的考察。即便是从宏观上考察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进的少量研究成果,也大多是基于传统的视角与思路,缺乏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逻辑的新发现。如何从传统研究视角中跳出来,寻求新的思路来解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演进,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为此,本文将以前《新民主主义论》中“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一概念作为切入点,还原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进的历史坐标,进而揭示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力求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与解读新民主主义文化。

一、一个新的切入点:“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的提出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1940年,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考察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主要文献。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四个阶段进行了历史分期:第一个时期是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二个时期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大革命时期的结束,第三个时期是1927—1937年的新的革命时期,第四个时期是抗日战争时期。^{[6]689-702}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只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第四个时期给予了明确的命名,称其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对前三个

阶段并未命名。但这并不影响进一步考察与探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演进,“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的概念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毛泽东对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一直十分关注。其中,毛泽东认为联结政治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纽带就是统一战线,即阶级的联合,称统一战线“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也是如此”^{[7]27}。所以,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7]32}。“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一概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被提出来,是他这种主张的集中体现。出于对政治与文化内在联系的准确把握,毛泽东将作为政治概念的“统一战线”,视为文化发展不同阶段划分的依据,并用“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的具体概念来命名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反映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上认识的加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称“现阶段上(作者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6]706}。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独特理解,包含了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具备革命阶级“联合文化”属性的思考——其政治基础为革命阵营中各个阶级的联合,形式上表现为围绕不同革命阶级联合所形成的一元主导的多样性文化。其中,“一元主导”指的是无产阶级居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地位,共产主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无产阶级文化居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导地位;“多样性”指的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及其思想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理解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它不仅仅在于揭示新民主主义文化具备统一战线的政治属性,扩展了文化划分的理论视角,促使我们从传统的、既定的思维局限中跳出来,改变或从单一的阶级角度界定文化形态,如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或从社会性质、意识形态的分野来界定文化形态,如从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来划分文化的习惯;同时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来观察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演进:《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可以划分阶段的

判断,实际上是承认了阶段与阶段之间有一个演进过程。虽然对于各阶段之间的承接关系,毛泽东没有给予深层次的理论回答,但是结合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一种统一战线文化的判断,以及用“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命名抗战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便能将整体上考察新民主主义文化历史进程的宏大视野聚焦到统一战线这一具体的理论支点上。遵循这种思路,通过对历史信息的捕捉以及回顾梳理发现,新民主主义文化各阶段的变化离不开统一战线的内在演变,换言之,统一战线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进的动力之一。

二、历史坐标的还原:统一战线视域下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演进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逻辑推导的正确与否,需要依靠历史过程的还原;历史坐标,正是理解理论逻辑的唯一真实基础。由于除“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之外,其它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没有被命名,因此,只能通过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回顾,来验证统一战线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进动力的准确性。本文将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各阶段的划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为视角,来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演进轨迹,并且遵循《新民主主义论》中“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概念提出的基本原则与思路,对不同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出相对应的命名。

(一)1919—1921年:“五四新文化”

1919—1921年,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进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可以称之为“五四新文化”,其特点为反帝反封建文化的初步形成。之所以作出如此界定,原因有二:一方面,这一时期所处的历史阶段,又称“五四新文化时期”,学界已有共识。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以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肯定,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共通性。而对于五四运动自身内部的结构变化,毛泽东早已作出论断:“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但到“六三运动”^①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6]70} 政治上的阶级联合范围的扩大,很快引起了“五四新文

化”在文化内涵上的变化,使之在实质上成为了一种阶级联合即统一战线的文化。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新兴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为两面旗帜,“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学术被作为反‘科学’与‘民主’的对象而遭到全面的批判”^{[8]2},其被认为是“与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的侧面”^{[8]28}。这两面旗帜的高举为封闭落后的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解放提供了指引,并有效地将中国人民团结了起来,进而为不同阶级之间在行动上的联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则是“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6]700},这两面旗帜提倡反抗传统的斗争精神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反响,尤其是对知识分子来说影响深远,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后迅速转变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这个时期所倡导的新文化“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6]700},但“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6]700}。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五四新文化”,也可以说是早期形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而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正是之后不惜余力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各阶级实现联合(包括政治上与文化上),最终实现民族大团结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与先进文化的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辩证的联系。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人是文化动物,人类社会是一个客观世界,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文化观念的连续更新,必然会反作用于客观世界,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和发展。而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因为有了先进政党的领导而产生新的变化,才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二)1921—1927年:“新三民主义的文化”

1921—1927年,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统一战线发展史来看,国共两党在这一时期的合作是革命阶级之间的一次重要联合。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一大”上所确立的“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的联系”^[9]的政策,促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可以称之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文化”,或“新三民主义的文化”,主要

① “六三运动”使得五四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上街演讲遭到反动军阀镇压,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工人举行罢工支持学生,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政治罢工的形式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标志着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形成了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

特点表现为不同政治文化的联合,即两个“主义”的联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列宁和共产国际强调各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建立合作关系,以加强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①。在其指导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加速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也逐渐认识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国民党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10]。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的政治基础是孙中山晚年提出“新三民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主体是国共两党,阶级构成包含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些反映在思想文化层面,便是两个“主义”的合作。毛泽东曾经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6]701},并在1937年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将其视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11]259}。“新三民主义”不仅成为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国共合作的思想文化基础。之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提出,显然是对共产主义思想持有某种肯定的态度,承认无产阶级思想在国民文化中应有的地位^②。思想观念上的认同与肯定,是结成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统一战线必不可少的前提。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当时的进步作用给予了肯定^③,同意团结各革命阶级在文化上结成以新三民主义为标志的统一战线,从而使得“新三民主义的文化”具备了统一战线文化的性质。

“新三民主义的文化”在实践中与统一战线相互配合,不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文化的斗争,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如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等就曾共同宣传反帝思想,前者相继刊发了《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革命与反革命》《国际帝国主义与东方被压迫的国家》等文章,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后者则发出了“专制无不乱之国”^[12]的呐喊,倡以“法治为标准,使借口政略者无所饰其奸,永绝君权政治之余孽”^[13]。两者共同反对尊孔读经,共同反对封建的旧文学,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新三民主义的文化”在传播范围上已经超越了“五四新文化”,突破了知识分子狭小群体的限制。如在大革命的高涨浪潮中,大量的农村学校得以建立,尽管条件简陋,多是利用农村原有的祠堂、族校等场所,但却让政治宣传深入穷乡僻壤,使得革

命观念开始在乡间传播,农民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得以启蒙,“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11]35}。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地区,农民们禁迷信、打菩萨、办学校,高喊着“打倒洋财东”,造成了空前的文化变革。这种变革毫无疑问对之后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工农政权的顺利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1927—1937年:“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

1927—1937年,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个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可以称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阶级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民族资产阶级附和大资产阶级离开革命而去,两者皆退出了革命统一战线,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结成了统一战线。因此,此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有了不同于上一阶段的特点,即重点强调坚持无产阶级文化的领导权以及建设工农文化,这成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的主要内容。

尽管遭受到了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在苏区与国统区都得到了推进。在苏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贯彻“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13]331}的文化教育总方针,以“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13]328}。具体来看:一方面,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运动,发动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如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依托各类纪念活动,建立起各类研究会,并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

① 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会上谈到共产党和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只要民族革命政党不反对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就应支持它,并提出:在中国国民党确实是革命民主政党,它做了伟大的革命工作,希望共产党将来同它并肩战斗。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

② 毛泽东曾对来访的史沫莱特说过:“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参见1937年3月1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史沫莱特的谈话》。

③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共成立初期一些资产阶级的文化主张后来成为中共文化理论的重要来源,如孙中山所倡导的“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以及学习西方不可“照本抄誊”,“不宜盲从他国,致为人利用”的思想,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中主张吸收借鉴外国进步文化,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产生了较大影响。参见陈金龙.孙中山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J].教学与研究,2000(8):62-68。

共中央党校前身)和苏维埃大学,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工人运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课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课程教育学生同志”^[14]。另一方面,建立起服务于工农联盟的各种文化事业,用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武装工农群众。如1934年,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34种,包括《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斗争》《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文化》《挺进》《战士》《前线》等刊物。其中,《青年实话》的发行量为二万八千份,《红色中华》的发行量从过去的三千份增加到四五万份以上,《斗争》光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销售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为一万七千三百份^①,工农群众文化水平得以大大提高。需要注意的是,苏区文化工作的具体开展过程中,出现过置实际阶段于不顾、“急于搞社会主义”^{[15]104}、超越阶段的倾向、“不懂得应该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15]104}等现象,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后期得以及时纠正。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反“文化围剿”的左翼文化运动,这是发展“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的重要实践部分。其中,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国作家左翼联盟”(简称“左联”)既是政治上的统一战线组织,也是文化上的统一战线组织。在阶级构成上,“左联”包含了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主张文艺大众化,既包含“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也包括“作品的大众化”,并最终要实现“其他一切的大众化”。在此基础上,“左联”进一步要求将“文艺大众化”和“反帝、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16],倡导以工农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鲁迅曾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率先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指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战线也就统一了^②。毛泽东曾称赞“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6]698}。基于此,“左联”作品多反映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激烈矛盾,带有浓重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左翼文化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同时配合了苏区的反军事“围剿”斗争,体现了统一战线文化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同时必须看到,在左翼文化运动过程中,由于小资产阶级情绪与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内存在着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没有将资产阶级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加以区别,这些错误后来得以纠正。

统一战线是不断演化的。以“九·一八”事变为节点,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由三个阶级变为四个半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与

部分大资产阶级(半个阶级)逐步加入到统一战线当中来。这反映在文化层面上,就是这“一个半阶级”所主张的抗日文化不停地向“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靠拢,并最终被吸纳进来,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向下一阶段演进。

(四)1937—1945年:“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唯一被毛泽东明确命名的阶段,即“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6]698}。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主题是抗日,首要政治立场是民族立场,主张通过文化认同促成政治认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因此,伴随坚持抗日立场的阶级队伍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阶级构成及其斗争对象发生了改变,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特点也出现了变化,抗日文化逐渐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

“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第一,工人阶级与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主体是工人与农民,“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6]708},这是由他们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动力与主力军所决定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确立了“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7]854}的大众化文艺路线,其实质就是主张通过通俗化的语言来普及文化知识,使处于社会底层、过去无法接受良好文化教育的工农劳动群众能够获得精神解放。第二,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马克思^[18]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阶级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阶级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6]698},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倡大众化的必然要求,“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17]855}。第三,“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的性质是各革命阶级思想文化的联合,“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7]117},即在坚持无产阶级文化领导地位的同时,

① 参见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34年1月22日。

② 参见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年3月2日。

允许包括资产阶级甚至是地主阶级各种进步文化的存在。对于这个联合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17]849}。第四,“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的指导原则是统一战线。文化服从于政治,这个阶段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17]867}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17]867},具体来说,就是“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7]16},用文化促团结,“做文章、画图、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

抗日战争作为一场总体战,不仅包含了军事斗争,还包括了精神文化领域的斗争,而作为战争的精神引领,革命文化“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17]866}。“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所倡导的革命文化直接担负了起同“殖民文化”与“汉奸文化”斗争的两大历史使命,在文艺战线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启发群众的民族意识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通过撰文办刊,对“曲线救国”等汉奸言论进行猛烈抨击,揭露“汉奸文化”卖国求荣的邪恶本质;开展抗日宣传教育,采取多种方式启发群众的民族意识;“北平、天津等地的党组织通过读书会等多种形式教育进步青年,使他们中的不少人自觉投身地下抗日斗争”^[20],等等。“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宣扬进步文化,团结教育民众,粉碎了一切不利于全民族抗战的落后文化,配合其它战线的斗争,正是全面抗战路线以及全民联合在文化战线上的集中体现,充分展现了其作为统一战线文化的巨大影响。

(五)1945—1952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并没有对此阶段的划分,但是按照毛泽东关于划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思路,结合之后的历史发展,可以将这一阶段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进的第五个阶段,称之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①。

抗日战争之后,中国革命的对象再次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后台美帝国主义成为了革命的首要对象,解放战争“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21]。这一时期,大资产阶级再次退出了革命统一战线,不过却使得更多同情且认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社会进步人士加入到统一战线中,从而形成了更为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促使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继续演进,以反对国

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独裁与文化专制。事实上,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围绕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在文化战线上展开了激烈斗争,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开展了斗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比较集中表现在以下历史事件中:围绕1945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五项协议,国共两党进行了斗争。尽管中共作出了巨大让步,但国民党政府却在最后撕毁了协议,暴露出“假共和、真独裁”的专制面貌。政协五项协议的通过,使得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存在成为可能,实现了毛泽东所称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坚决斗争的结果,同时也表现出了后者对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带有鲜明新民主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的认可。以“五二〇”运动^②为标志,广大青年学生同独裁专制文化开展了英勇斗争,标志着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第二条战线包括各个革命阶级和阶层,但其先锋是广大青年学生。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反蒋爱国运动中,表现积极,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文化人士还为此献出了生命;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展开了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中间路线的实质是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主张,它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贯追求的“理想”。由于历史的机缘,它曾经一度成为解放战争时期非常活跃的思潮。基于此,在很多大城市公开进行的批判中间路线的辩论,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中的主导地位,牢牢地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进方向。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建设,以《共同纲领》为基本依据,仍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面,废除国民党的反动教育,建立和加强革命教育;发展和改革小

①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仍有大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需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线索是没有中断的,奉行的仍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只是在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在思想文化领域,才“从过去着重于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宣传,配合各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进行思想工作,转向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宣传,教育全国人民”(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275),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就逐步被社会主义文化所取代。这也正是本文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时间下限放在1952年的原因。

② 毛泽东称其甚至“超过了‘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规模”。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12。

学、中学和高等教育；文艺方面，建立“文联”等组织，制定科学的文艺方针，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继续发展的基础，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有序发展准备了条件。之后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内部的一次整肃。1951—1952年，北大教员发起了政治学习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有效的。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初始，由于还没有出现的“左”倾的偏向，也是较为平稳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作用，加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是与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将转向社会主义文化，其内部结构面临必要的调整是分不开的。

通过对上述具体历史坐标的还原，本文得出统一战线的内在演变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历史演进的动力之一的结论，这种演变促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阶段性变化，使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在历史坐标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其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统一战线自身队伍（阶级构成）的变化，成为引起新民主主义文化阶段性演进的主要依据。参加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队伍十分庞杂，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进进出出，引起统一战线队伍的变化，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统一战线斗争对象的变化，成为引起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阶段性变化的另一重要依据。“帝国主义是有分有合”^{[15]97}，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是有分有合的。某些特定条件下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其中某些派别有进入统一战线内部的可能，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呈现阶段性变化的外部原因。除此之外，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的变化，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决定了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领导权，但无产阶级领导权并不是被天然授予的，而是需要夺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这种认识与实践同样贯穿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进的全过程，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寻求与巩固对先进文化的领导，以及加强与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指导地位。

三、统一战线视域下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进的历史启迪

尽管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提出已经八十年，但它对于当今处于社会转型关口的中国来说，如何在社会层化日益明显、利益分化日趋严重的现代化浪

潮中弘扬先进文化，弥补思想分歧和裂缝，凝聚共识以寻求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它所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如何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无法与近代中国的独特国情相割裂，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划分若干各历史阶段，这本身就是基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践所进行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强调民族性，把“民族的”文化摆在首位，称“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离不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6]664}，重视文化的民族形式与民族内容，主张用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广泛团结大众，以对抗帝国主义的思想奴役和文化侵略，这是“中国特色”的题中之义，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所一直探寻的。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而来，两者在强调“中国特色”的理论特质与实践品格上一脉相承——新民主主义文化至始至终围绕民族“独立与解放”这一近代革命主题，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引领中国人民最终走向革命胜利；如今文化建设则需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主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需要坚持文化发展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文化是以多样化的形式存在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各有其形态、内涵和特点。”^[22]文化主体构成在内部的多样化，决定了文化内容在外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重点突出了其包容性与多样性，认为在外部需要与其他民族的新文化“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主张“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内部“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6]706}，而是统一在“反帝反封建”旗帜下人民大众的文化。如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让多层次的社会生产力得以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多层次生产力决定了反映它的文化必然是包容的和多样的。因此，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延续，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依然需要靠包容性与多样性来支撑，这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在制定具体的文化政策时，则需要有更深的现实考量。

(三) 需要坚持加强文化队伍建设

先进文化的创新和传播离不开文化队伍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引领,与一支强有力的文化队伍密不可分。尽管在队伍内部的阶级构成上有过反复,但却保持了总体上的平稳。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建立与巩固良好的政治基础,使革命的文化队伍迅速壮大,从而加速了新的先进文化理论的产生和传播。文化队伍的建设不仅体现在一定规模的数量上,而且既要有专业的文艺队伍,又要有普通群众的积极参与,凝聚集体智慧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毛泽东曾就指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7]49}今天,社会主义文化队伍空前壮大,他们不仅是人类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等不正常现象,而加强文化队伍建设,助力先进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无疑是从源头上遏制这一现象的有力措施。

四、结 语

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在近代中国历史坐标上的同步演进,实质上是政治与文化之间互动的产物,这其中包含了近代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复杂的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等因素造成了思想文化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而引起了文化形态的动态变化,具体表现为统一战线的内在演化促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演进。必须看到,这种复杂的互动在二十世纪中国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发展轨迹当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现实功能。其结果是,不同革命阶级在政治上实现联合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成为其文化联合的重要动力,同时这又是各阶级在思想文化层面取得共识、接受革命的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最终成为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保障与精神动力。这种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其表现与结果在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发展置于统一战线视域下并加以观察后,变得更加清晰了。当然,本文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历史演进的考察只是粗略的,诸多细节还有进一步研究探讨的空间。本文希望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与视角,跳出传统的既定思维,拓宽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研究视野,以达在学术研究上不同领域的融会贯通,与此同时,亦为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一点借鉴,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罗平汉.重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J].毛泽东研究, 2015(3):4-11.
- [2] 吴默闻,丁俊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30(1): 70-76.
- [3] 李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 6(4): 52-57.
- [4] 周锦涛,陶连洲.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略思想的体系性探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44(1): 1-11.
- [5] 郑师渠.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7] 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8]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M].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 [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9.
- [10] 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109.
-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12] 袁.本报发刊词[N].民国日报,1916-01-22.
- [13]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中央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14]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483.
- [15] 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 [16] 文振庭.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3-4.
- [1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18]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 [19] 陈晋,王均伟.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63.
- [2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774.
- [2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484.
- [22] 陈金龙.文化多样化新特点探源[N].人民日报,2019-03-22(010).

(责任编辑:陈丽琼)